



真日本

許希哲 著

《真日本》系列
第一卷：《真日本》
第二卷：《真日本》
第三卷：《真日本》

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录

樱吹雪	1
爱有期	3
泡泡袜之恋	5
好色	7
非色	13
穿和服的女人	19
女坂	21
白与红	25
请让我成为您的孩子	29
跪在她脚下	33
东洋年	36
秋刀鱼之味	38
八公犬	39
茶之道	41
大写的吃	44
日本人的表情	48
向“生”而“死”	52
入佛界易，入魔界难	55
渡边	65
打屁股	69
另一道风景	73
不劳动的节	75
当“做”成为“活”的方式	77
放逐至水	79
天知，神知，你知，我知	82
三岛由纪夫、平冈公威与我	87
自由下的囚徒	89

道歉	96
“终战”的一天	99
东京审判	102
永远的困境	105
罗生门下	114
从《罗生门》看《竹林中》	125
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133
日本病后	141
外人	143

樱吹雪

上辑

东洋列岛，新年伊始，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每个月忙忙碌碌都有花期。一月梅花，二月桃花，三月樱花。这花是一种比一种开得娇软，桃花已失去了梅花的挺拔，樱花更没有桃花的翘首，简直弱不禁风，一阵风过，就飘下一大片。然而赏花的事却是越闹越红火。樱花从南到北，从冲绳岛到北海道，步步进军，日本人用个很形象的词：“樱前线”。那不夹带绿叶的樱红，野莽莽的，让人们恍惚身处的不是人间，而是某个不可把握的地方。那些樱树下的飘荡着的不阴不阳的日本小调，摇曳着的怪里怪气的舞姿，那些天当房、地当桌的人们，那些头发梳得精亮的男人和涂着厚厚脂粉的女人，那些汹涌的赏樱人潮，都让我们在感觉不可思议的同时，又有着隐隐的惶惑。果然，一场大雨就使得这一切销声匿迹了，宛若造物主将世界翻了个面。

提起日本的花，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樱花。但日本的国花并不是樱花，而是菊花，然而樱花却是象征大和魂的。日本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物哀”，就是对物之易逝的伤感，一如对只开十多天的樱花。在中国，也有“转蓬之概”、“忧生之嗟”，比如晋人。但晋人由“哀”而转狂狷，日本人则是由“哀”而沉湎。“哀”不是达到“不哀”的手段，“哀”本身就是目的。这似乎更符合“哀”的本质了，当我们哀伤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别人把我们拉出来，诉说，也只需要你倾听，诉说本身就是目的。那种开导、劝导的企图是令人讨厌的。实际上，沉湎于“哀”，有一种“哀”的美，凄绝的美。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了不少樱花，最著名的一幅《花明り》，题作“明”，其实并不明，不是明艳，而是凄艳。

日语中有个美丽的词，形容樱花飘落：“樱吹雪”。“美少女战士”北川景子的一首

歌，就叫《樱吹雪》。据日本《广辞苑》解释，“樱吹雪”就是樱花的花瓣像雪花一样纷乱飞舞。那年在东京上野公园，就看到了这种情景，梦幻一般，让你分不清是雪纷纷从天上降落，还是花瓣纷纷飞

上天离去；分不清是来，还是去；分不清生，还是死。日本人把死看成是新旅程的开始，他们把死叫作“去天国”，我们中国虽然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是真的恐惧死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走这条不归路的。但是日本人似乎不。2004年10月12日，一天之内，日本就有两起集体自杀案件，富有趣味的是，其中一个就是在埼玉县以观赏樱花闻名的美之内公园。四男三女共七个年轻人，租了一辆车，车内放了四个炭炉，烧炭自尽。他们还把车窗用胶带密封，还在车外盖一大片蓝色帆布，显示死意坚定。在日本，自杀不是个别现象，东京以西的静冈县的热海，就是“情死圣地”，更不用说大量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以死的方式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作品。三岛由纪夫切腹，川端康成打开了瓦斯。川端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人生最绚烂时自杀的，有人用“人生最璀璨时，不忍见樱花凋落、杜鹃悲鸣”来解释死因。三岛事件，看似因为“忧国”，但也难说没有对自身生命的恐惧，不能忍受健美身体终有老朽的一天，他要趁自己还没有衰老，把精彩定格下来，让其产生“刹那的永恒”。某种意义上说，与其日本人追求的是活得精采，不如说追求死得漂亮。

从织田信长到三岛由纪夫，到川端康成，太多的日本人像樱花一样在瞬间灿烂之后，慷慨赴死，以达永恒。灿烂，死亡；瞬间，永恒；乃至其中包含着的耻辱与光荣，这几对意义完全相反的词，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揉在一起，但在日本人思维中统一了，在樱花的品格中统一了。我甚至想，所以不了解日本，是因为不了解樱花。“二战”期间，当盟军舰队遭遇日军“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撞击，看着成群战机樱花般凋落，直坠在军舰甲板上，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是，发生了什么了？在日本这民族身上发生了什么？在日本人内心里发生了什么？这些彬彬有礼的日本人，这些爱花爱美的日本人，他们怎么了？我们不明白日本文化有着两面性：文雅而又暴躁，赏花落泪而又杀人不眨眼。

爱有期

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小说《一年后》，讲了一个奇特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惠理子失恋后，偶遇男子田村。但田村已有女友，他们就在田村女友去美国的一年期间，定下了爱情契约。她对田村说：仅仅是这一年，能和我恋爱吗？

这勿宁是个残酷的故事。这小说后来被搬上了银幕，片名改成了《东京万寿菊》。万寿菊，是一种有很特别香味的菊花，但它只有一年的生命期。在这一年里，开花，结果，然后凋谢，就像那场爱情。导演市川准阐述说：其实并不是每一场爱情都能天长地久的。确实，像万寿菊那样短暂地开放，然后迅速枯萎的爱情，在现代的社会随处可见。

枯萎了没问题，如果尚未枯萎，那怎么办？甚至爱还可能会越来越浓烈。人毕竟不是物，物租了一年，该归还就归还。人不行，人是有感情的。常听一些人说不敢养狗，害怕养出感情来了，舍弃不掉。人是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要飞起来。那么，怎么能控制这爱只能到一年为止？

我常想，人最可怕的是想到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其实末日突然降临，并不可怕，在你还没感受到苦难的时候，苦难已经结束了。所以那些突然被夺去生命的人，还应该是幸运的，被车撞死，被突然飞来的东西砸死。相比之下，跳楼就比较残酷了，从落下到着地，总有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怎么办？类似于“凌迟”，刽子手杀“二七烈士”林祥谦，一刀一刀切他的肉；曹禺《原野》里的仇虎复仇，是把仇人的孙子杀了，让仇人活着，活受煎熬。所以麻醉死亡是人道的，让意识消失；所以拿枪自杀的人就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一抠扳机。我青春期时，老焦虑自己将来怎样死，我总是必死的，可生命就像吹大了的汽球，要让它消失，只能把它压爆。为什么会有汽球这比喻？因为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的自己就是一个汽球，它被吹得满当当的，眼看要爆炸，我不知该怎么办。当然我可以解开扎口的线绳，但是我就是解不开，人是不可能解得开自己的结的，只能任它膨胀。它几乎

透明了，马上就要爆炸了，但是它还没有爆炸，它只是用爆炸吊着我，漫长的等待爆炸，不可自拔地走向爆炸。可怕的不是它要爆炸，而是它走向爆炸的过程。

这不是《一年后》后里的事情，是另一个故事。他和她，三年前认识并且相爱。他们的期限是三年。三年之后，她必须离开他去她丈夫所在的城市。这是不可改变的。在这三年里，他似乎忘记了这个事实，他觉得她就是他的，只有她去她丈夫那里探亲时，他才明白她不是他的，不能忍受。他不能忍受她和她丈夫在一起，不能忍受她丈夫奸污她，但是她丈夫有权利对她这样，他是她的丈夫，那也不叫奸污，叫“同房”，甚至叫“做爱”。每次她去她丈夫那里，残酷的现实都会顿然摆在他面前，他都会痛苦不堪，像间歇性精神病发作，直到她回来，一切暂且平息。假象掩盖了真相，她还会不会再走，姑且不管了，反正过一天算一天。但是现在，她要彻底离去了，彻底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了！已经定了离开的时间，余下的每一天都得数着过了。过一天，就走向死亡一天，他清晰地看着死亡在一步步走近，他简直崩溃——倒不如，把它给掐了！

据说古巴革命后，被判处死刑者可以有个最后的愿望，许多人选择了向行刑队发出“开枪”的命令。既然不能把握生，那就把握死。迎向死亡，未尝不是明智。当然最好是最初就死，不让爱情发生。现代人有句话：不要爱，只要取暖。那么，一夜情就成了极好的选择了。如果仍害怕这一夜走火入魔，情不可收，那么就干脆去嫖，绝对干净、利落，不会像流产失败一样滴滴落落。只要有理性，没有人会把妓女当做唯一、永远可以拥有的女人。何况还会厌倦呢！所以就不必焦灼了。我想，《一年后》里的主人公实质上就是抱着这种“嫖”的心态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冒犯，娼妓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也许嫖娼的心态，正是文明人的理性心态。奈保尔不是说感谢妓女吗？所以才能成功了。女主人公最后跟田村告别，她说：这一年过得真好！

泡泡袜之恋

曾经奇怪日本女孩子为什么爱穿超短裙，小腿上搭配一双泡泡袜。她们很多明明长着一双“大根あし”（萝卜腿），又大又粗，却也不怕把她们的腿部暴露出来。那种泡泡袜粗厚，臃肿，笨拙，她们本应裹上长裤，要穿袜子，也应穿长筒丝袜的，也好矫正一些。但丝袜，却另有所属。

什么是泡泡袜？它是一种比普通袜子稍长、稍厚的毛袜，穿在脚上松松垮垮，似脱落非脱落，让小腿若隐若现，既清纯又淫荡，既暴露又掩饰，害羞而压抑，让人们想入非非。在日本的 A 片和色情广告中，经常有这种装扮的女角，再穿上日本女生的制服：水兵服。像大盖帽之于女警官，护士服之于护士，围裙之于主妇，长丝袜之于 OL，水兵服和泡泡袜，成了青春女生的标志。

别说日本人色情，其实人的本性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日本人能更平常心地面对色情。在日本，“色”未必是个贬义词，奈良时代，“色”指的是色彩和表情，平安时代又增加了华美和恋爱情趣的内容，“好色”是包含着肉体和精神乃至美的结合的。日本女人以有魅力为荣耀，要是你夸奖她们漂亮，你定会得到感谢，而不会像我们中国女人那样，觉得你不正经，冲你翻白眼。（近年来这种情形似乎少了，而且我发现，中国年轻女孩子也学会像日本女性那样的一惊一乍，比如爱发出“厄”的惊叫或叹息。）但日本男人称赞女性，用得最普遍的并不是“漂亮”（きれい），而是“かわい”（可爱）。这当然有对方实际条件的因素，比如大多实在不漂亮，你说她漂亮，反怕被认为是对她的讽刺。而年龄大的，也不能称“かわい”了，就说她“やさしい”（温柔）。从“きれい”，到“かわい”、“やさしい”，一个比一个重感受。日本人是注重感受的，我们可以猜想，泡泡袜所以迷人，是因为对它的感受：它的形状，它所在腿部，让你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联想。

走在东京街头，时会看见成人用品店里收购或出售女性穿过的内裤，以带着体液的为佳；你还会偶尔撞见车站口，有男人拦着某个少女，求她在自己手绢里吐一口唾液，然后如获至宝地收藏起来，或是

让她吐到准备好的杯子里，他当场喝下。你难以理解，如此脏的东西，他怎么视为甘露？但实际上，最巅峰的享受，是跟脏、乃至死不可分离的。袜子穿在身体直接跟地面接触的脚上，也就容易让人感觉脏。大凡恋物，实质是恋人。因为不敢直接爱对方的人，于是迂回去爱对方的物，对对方的物加以崇拜。于是这个物越是卑贱，对之顶礼膜拜，就越显示出自己的“贱”了。在这里，“爱”和“贱”达到了奇特的统一：“爱”通过“贱”来达到。因为爱得太深，所以仰视对方（这仰视的角度与爱的深度成正比）；因为仰视，所以感觉自己太卑微；因为感觉自己太卑微，觉得不用践踏自己，就不能得到对方的怜悯；即使对方怜悯自己，也要自我践踏，才显示出自己的狂热和虔诚；把自己践踏成一钱不值，就能依附在对方身上了；把自己践踏成肉酱，就能跟对方交融在一起，从而如胶似漆。用自己身体里最要干净的嘴，去吻对方最不干净的脚，就是一种痛快的践踏。于是谷崎润一郎的《富美子的脚》里，老主人弥留之际，让女佣富美子用脚指头夹着棉花，蘸米汤喂到他嘴里。关于爱女人，我家乡也有一句话：少年爱脸，青年爱胸，中年爱臀，老年爱脚。爱脚，是最高的境界。当然也可以说，越爱越不着点了。也许越不着点，却越切近本质？

在盐田明彦的《月吟》里，男主人公爱恋女主人公，就偷拍她的照片，走她走过的路，收藏她穿过的泡泡袜。夜幕降临，他独自躲在卧室，嗅着她用脏了的私物自渎。而当女主人公身体实实在在摆在他面前了，他却置之不理了。虚拟的力量是强大的，因为其虚，所以可以强大到无限大；因为其是意淫，所以无所不能。在日本曾听说，一个强奸犯在扒光对方后，却掏出自己带的女生制服和泡泡袜，要对方穿上，然后才做事。这是案发后被曝光的。没有被曝光的，不知道还会有哪些情形，比如一个丈夫让妻子穿上泡泡袜，然后做爱？

好色

1

十年前在东京，听到日本男人当面夸奖女人漂亮，甚不可思议。要在中国，定被啐为“不正经”了。即便是情不自禁，也应该藏在心里的，所谓“发乎情，而止于礼。”当然，现在的中国也已不“止于礼”了，甚至在男女关系上的大胆，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是不是一种进步。

都说日本人好色，连西人都为之愕然。十九世纪，有一个德国医生叫 Siebold 的来到日本，在江户近郊见到全裸的嫖客在妓院无顾忌进进出出，不禁瞠目结舌。他在他的《江户参府纪行》中这样记载：“妓院像餐馆一样同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白天公然进出于妓院，如同进出咖啡厅。”看日本的文学作品，更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了，比如众所周知的《源氏物语》。其实在《源氏物语》之前，还有一部《伊势物语》，不过是和歌物语，不是叙事形式的传奇物语，但“色”的味道丝毫不差。《伊势物语》写的是贵族在原业平连同一些好色男女的风流帐，据说这个在原业平是有名的风流美男，一共跟 3733 个女子有染。至于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等作品，更是直接以“好色”为名了。这些作品，甚至有个直截了当的称呼：好色文学。

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确实有着“好色”的传统。但这“好色”跟我们理解的含义并非完全一致。“色”这概念，在日本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根据叶渭渠先生的说法，在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色”，只是指色彩、表情；到了九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平安时代，“色”的概念有所发展了，被加上了华美、情趣等内涵，而“好色”，则是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跟汉语中的意思并不一样，并不是指色情，而有着肉体和精神的一致性的内涵。所谓“好色文学”，就是以恋爱情趣为主要内容，探索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深层的人性。这么一说，就不惊世骇俗了。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个国家、民族的文学乃至文艺，无论是欧洲的、阿拉伯的、非洲的，不是如此呢？这似乎还是艺术的本质特征。

即便是传统中国，也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不过在日本人这里，被推到了极致了。

日本这民族的长处之一，就是什么东西在它手里，都被发展到了极致。比如从中国来的茶道、花道，在中国人这里，无非是喝茶活动、插花艺术，至多是修生养性，到了日本人手里，就变成了“道”；又比如从西方来的电器。“好色”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古代甚至有“好色家”。“好色”成了家，听起来就匪夷所思。“好色家”并不是谁都能当的，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和歌的名手。当个名人，已是不易，那些“追星族”一定能深切体会的。这还不够，还必须具有“礼拜美”。什么是“礼拜美”？就是在一切价值中以“美”为先。这更不容易。现在许多明星，只能做到人前“美”的，在台上，在镜头前，憋住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化着妆，取个特定视角，端着个神采、礼仪，下去之后是怎样的呢？狗仔队偷拍到的他们日常状态，往往让人失望。套用个耳熟能详的句式：一个人在人前“美”——“美”并不难，难的是在一切时候“美”。这一点，“好色家”是要做到的。

“好色”，在日本人的精神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它。即便是宗教，比如佛教。佛教在日本可谓势力强大的，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企图以推广基督教来抵制佛教，也没有动摇过佛教的地位。公元六世纪，佛教传入日本，按一般的推断，“色”该寿终正寝了，然而却没有。佛教在日本衍生出了许多宗派，这些宗派却几乎都打破了佛教中禁欲的戒律，其中就有“戒色”。有趣的是，很“色”的浮世绘的“浮世”，恰是来自佛语，颇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味。

在日本，僧侣是可以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父亲就是佛门弟子，生下了这个著名的儿子。据说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候，摄政的关白有个女儿，爱上了净土真宗的亲鸾小师傅，父亲甚是支持，可是对方是出家人，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事。关白就找来亲鸾的师父法然上人，问：“我今在家，上人出家，我们同是念佛，是否功德同等：同生西方，同了生死？”法然上人自然点头。关白便道：“既然出家在家念佛同等，那么就请上人命令高足亲鸾与小女结婚！”法然无话可

说。自此以后，净土真宗的徒子徒孙都跟着沾光了。当然其他宗派仍然在死守着，但是口子一破，只是时间问题了。

“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这首《梦闺夜话》，是“破戒不惭的狂僧”一休的生活写照。“一休哥”在他七十八岁高龄，遇到了一个盲女，有了感情，他索性让自己从此坠入爱河。他还写情诗袒露自己的爱情生活，宣称“淫酒淫色亦淫诗”。这比那个把女孩抱过河的中国和尚冒渎多了，日本人真能把事情推到极致。也许，到了极致，才到了境界。这才是到了境界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有”才是根本。宗教的根本精神是反体制、反世俗的，在这个根本里，坦荡与好色并不矛盾，“真”与“美”恰是一回事了。

2

一直不明白梅兰芳美在哪里？据说他幼年相貌平平，小圆脸，眼皮下垂，无神，还常迎风流泪，秦老太太为他下过评语：“貌不惊人！”其实何止是幼年，他一辈子也没有漂亮过。作为男人，即便是留了胡子，也不够男人气；在舞台上扮女人，如果撇开演技，那模样也无论如何不算美女，既不水灵，也不轻盈，其妩媚也是怪怪的，也许艺术这东西，就是怪怪的吧？

当年梅兰芳到了日本，引起了轰动，当然日本人是爱艺术的民族。明确地说，日本人有着这种审美取向。从日本回来的鲁迅先生对这点是有点明白的，所有他说：“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谓“男人看见‘扮女人’”，其实就是男人把对方这个男人作为女人，类似于男同志中的“1号”对“0号”。在日本，这种事并不鲜见，随手拈来的就是若干年前火爆的大岛渚的《御法度》。大岛

渚搞了“异色”的《感官世界》，多年后又搞了个“男色”，再一次震惊了世界。

其实世界各国也都有这种事，包括中国。在明代，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日本最早同性恋描述，是成书于720年的

《日本书纪》，其中第九卷就有神功皇后二月条小竹祝和天野祝的故事，是汉文写的：

皇后南诣纪伊国，会太子于日高，以议及群臣。遂欲攻忍熊王，更迁小竹宫。

适是时也，昼暗如夜，已经多日。时人曰：“常夜之行也。”皇后问纪直祖丰耳曰：

“是怪何由矣？”时有一老父曰：“传闻，如是怪谓阿豆那比之罪也。”问：“何

谓也？”对曰：“二社祝者，共合葬欤。”因以令推问巷里。有一人曰：“小竹祝

与天野祝，共为善友，小竹祝逢病而死之。”天野祝血泣曰：“吾也生为交友，何

死之无宜同穴乎！”则伏尸侧而自死。仍合葬焉。盖是之乎。乃开墓视之，实也。

故更改棺衬，各异处以埋之。则日晖炳燦，日夜有别。

据说“男色”之风来自于中国。公元九世纪，密宗大师空海入唐求法，将唐朝佛教寺院里的“男色”风气传入日本。空海还将此道传给了他的弟弟真雅僧正，真雅僧正于是又跟平城天皇皇孙有染，这个皇孙，就是那个美男在原业平。

中国历来有“男女之大防”，即便是开放的唐朝，至少在佛教界，也是有所忌惮的。空海在大唐，其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但是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可禁的东西，人心是活的，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能以“女”为“色”，就以“男”为“色”。“男色”往往产生于“色”禁森严的寺庙、军队，乃至道貌岸然的宫廷。朱元璋之前朝廷大多设有官妓，朱元璋认为官员狎妓破坏政事，遂下令禁止，于是渐渐的男色就盛行了。“男旦”也就是在这时候产生的。其实，日本歌舞伎中的男扮女，也是源自于禁忌。阿国创建了歌舞伎，京都、大阪一带就出现了“游女歌舞伎”，除了演剧，还从事卖淫，于是当时的德川幕府就公布了禁止女人演戏的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女人

不让演，就男人来演，由年轻貌美的男子扮演女人的角色，叫“女形”，这就是“若众歌舞伎”，照样做那种事。当初是被禁没有办法的，后来竟乐于此道了，倒开辟了福柯所说的新领域，还时有殉情、私奔的事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男人“色”男人，并不是“男色”的全部。其实，“男色”这概念一直很含混。按中国《汉语大词典》的释义：“谓男子以美色受宠”，又说：“后指出卖色相的男人。”这都没有说明白“宠”与“买”的主体。也许是因为没必要说清楚，中国是男权社会，女人是没有主动权的，这主体理所当然就应该是男人。就连鲁迅，也只看到了“表面上是中性的，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但其实也有例外的，比如当女人掌权的时候，比如武则天宠冯小宝们。当然这在传统中国是特例，但是渐渐也不是特例了，还可以变换着面目“宠”和“买”，比如女人人们的看“男人扮”。这其实是个男人，男人扮成了女人，表面上看，我看的是女人，并不违反纲常，但其实心里想着的是这个男人。

随着时代的开放，后来就更大胆些了，比如女人看足球，其实大多是看踢足球的男人，女“球迷”，“迷”的是“人”，而不是“球”。至于看超男，则是明目张胆指点江山了。

女人“色”男人，在日本早就有之，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里的“好色”，就是女“色”男。女主角天性好色，纵横色界，凭借天生丽质及幼时良好家教培养出来的好气质，无往而不获。但随着年龄日增，容颜日衰，就不得不降格以求了。中国的文学，是男人站在自己性别的立场，写男人“色”女人的事，其中对女人的情欲描写，多是臆测乃至恶测。井原虽然也是男人写女人，但是却写得比较客观。当然这该归功于日本文学的传统，日本文学最初写作者往往是女人，写《源氏物语》的紫氏部是女人，写《枕草子》的清少纳言也是女人，女人写女人，就比较客观。当然当她们看男人，那目光也难说了。

男人要面临女人的目光，当然也面临同胞男性的目光。在这种种目光之下，不检点自己的形象是不行的，于是就得化妆。按一般的印象，武士是粗犷的，但是日本的武士也是化妆的。《叶隐》的作者山

本常朝认为，为了容貌的适宜，武士“最好要不断地照镜子”，“胭脂之粉，还是经常装入怀里的比较好，倘若遭遇万一，于醉醒或睡醒之时，脸色有时会一塌糊涂。”他描绘道：五、六十年前的武士，每天早晨起来，首先做的事就是沐浴，然后剃净月代，梳理好发型，往头发上喷香，修剪手足指甲，用浮石打磨平滑，为了使它艳若光鲜，再用金色草涂抹，时刻谨慎自己的起居坐卧举止。他自己也花费了很多时间这么做，因为“武士的工作，就是些这样的事。”

即便是死，也要死得漂亮。如果是很邈邈的样子战死，那么这武士平素的觉悟就值得怀疑，他会被敌人轻视，被敌人鄙贱，所以身体的教养要好自为之，化妆是作为武士的修养。听说日本女人把化妆看做对人的尊重，是一种修养，却不知道大男人也该如此。

男人一生两件事：功业，女人。有的男人为了功业，荒废了对自己形象的整理，邈邈邈邈；而有的男人则是为了女人，堕落得骨头酥酥，一身脂粉气。如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就用“美”。这种美意识也体现在了武士的武器上。欧洲的骑士们也有武器，那武器大多只是考虑到实用，想方设法防身杀敌；中国越王勾践的青铜剑，虽然剑身有规则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蓝玻璃，背面镶绿松石，但也没有日本武士的刀来得唯美。当年的佐贺藩的武士，连毛毯如何使用都不知道，可是进攻大阪城的时候，穿的战盔是用香熏的。我们还可以在《平家物语》中看到，出征一之谷战役的梶原源太景季，将一枝梅花插在铠甲的背上。这时候的武器，已经超越出了战斗的血腥，与其说是武士使用武器来制敌，勿宁说是敌人使武士发现了武器的瞬间之美，他穿透了这一瞬间，把握了美的存在。

说到瞬间之美，就想到了樱花。樱花花期虽短，但是当开则开，艳美异常；又当灭则灭，刹那寂灭，用寂灭把美瞬间定格了。三岛由纪夫就憧憬这种“瞬间美的闪光”，这种向死而生。他说：“存在的确证，只能通过存在被破坏的瞬间、死亡的瞬间来得到保障。”他也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杀了。

相传最初的樱花只有白色的，武士们喜欢在樱花树下剖腹，樱花树下血流成河，从此樱花就开出了红色的花。樱花的花瓣越红，说明树下的亡魂就越多。

“人是武士，花是樱花。”樱花是男人的花，武士是花一样的男人。

非色

1

《古事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二神降到岛上，树起“天之御柱”，建立起“八寻殿”。于是伊邪那歧命问他的妹子伊邪那美命：“你的身体是怎样长成的？”她回答：“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了，只有一处没有合在一起。”伊邪那歧命说道：“我的身体也都长成了，但有一处多余。我想把我的多余处，塞进你的未合处，生产国土，你看怎样？”伊邪那美命回答说：“这样做很好。”

日本国土就这样产生了。

世界上各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纪传说。这些传说，很多都跟男女之事有关。西方的是亚当夏娃，已经很著名了；中国的创世纪神是女娲，但女娲造人是跟男女无关的，她只是自己捏泥巴，这体现了汉民族的禁忌。但跟汉民族交往密切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的女娲故事里还有一个男人，就是伏羲。女娲和伏羲是兄妹，他们要结合，但这分明是犯禁的，于是就让老天来定夺，对天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烟合，于是他们行事，是天意，于是无关罪恶了。

西方人因为一次犯禁，就认为自己永远有罪，中国人也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日本人则不需要寻找托词，也没有罪恶感。往好里说，是坦诚，往孬里说，是“好色”。

都说日本人“好色”，但似乎也并不尽然。我曾说过日本男人见到女孩子漂亮，会直截了当加以赞美的，不觉得这是“不正经”，而觉得是坦诚。但高桥敷《丑陋的日本人》里面却又说，日本人对于外国人的直露表达方式颇有微词，他们通常不很轻易表达自己的爱，似乎又不坦诚了。其实坦诚不坦诚，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人不能都坦诚，也

不能都不坦诚，即便是阴谋家，也有暴露自己的潜意识冲动。爱伦·坡有篇小说就写了这种情形：罪犯一方面掩盖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地自我暴露。即便设想人是完全理性的，也有各种因素的制肘，不能都占其好，必须取什么，舍什么。实际上，日本人的为人处世是有一套“义理”原则的，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何为先，何为后，有个权衡的层次。在芥川龙之介《竹林中》里，强盗多襄丸和新娘真砂本来应该竭力逃脱杀人的责任，却都说是自己杀了武弘；而被杀者武弘本来应当恨不得法办了杀他的人，可他却也说是自己杀了自己，看似不合常理，但这是被“义理”原则所支配的。虽然人人知道生命的重要，杀人者害怕偿命，被杀者祈求伸冤，但是这种愿望如果跟更重要的原则相冲突，就不得不舍弃了。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人想要得到什么，就得舍弃什么，比如日本人不能随地吐痰，但随地小便，却似乎无所谓，这正应了我的家乡对日本人的评价：“有礼无体”。

“有礼无体”也是权衡后的产物。早年看过一部电影《望乡》，是根据女作家山崎朋子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有个副标题：《山打根八号馆》。山打根在哪里？在南洋。八号馆究竟是什么馆？就是妓院。明白地说，就是明治维新时期在海外南洋的日本人妓院。

有一本叫作《村冈伊平治自传》的书，就记载了当初在南洋的日本妓女。这个叫村冈伊平治的，就是当初带日本女人去南洋的人贩子，用中国现在的话说，就是“蛇头”。日本妓女不仅流向南洋，还流向其他地方。一个叫高桥谦的日本人曾经统计：明治 19 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 700 人左右，日本人的职业所，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以及两三家杂货铺外，过半数是娼馆。一个叫奥田乙治郎的曾经在《香港日报》上记载：同时期滞在香港的日本人共有 147 名，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卖淫，由此带动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

日俄战争之前的 1903 年，俄罗斯也在其租借地旅顺作过调查，旅顺共有日本娼妓 201 名。据大江志乃夫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关